

江苏明代作家诗论研究

芦宇苗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ZG011)研究成果
徐州工程学院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江苏明代作家诗论研究

芦宇苗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苏明代作家诗论研究/芦宇苗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305 - 07238 - 3

I. ①江… II. ①芦…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理论—研究—江苏省—明代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126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江苏明代作家诗论研究

著 者 芦宇苗

责任编辑 赵庶洋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8.25 字数 315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7238 - 3

定 价 33.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引言

从区域这一角度展开研究,已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各区域的发展存在着差异,且自有其独特的规律和特征。这种地区差异性,除了体现在地理沿革、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风土民俗等方面,在文学创作上也同样表现显著。它不仅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上有所体现,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审美倾向、思维方式以及创作风格等诸多方面,从而产生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对地域与文学的关系有所关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即是十五个地区的民歌土调,各个地区的民歌带有明显的地域风格。战国时期产生的楚辞,则明显具有楚地的地方特征。稍后东汉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不仅注意到地域与风俗的密切关系,同时还注意到地域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豳,公刘处豳,大王徙郿,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

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则进一步将地域风貌特征与文学创作风格联系在一起:“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①

特别是到了明代,学者不仅时常将地域与文学联系起来讨论分析,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以区域为主要特征的诗歌流派。胡应麟把明初诗人分为五派,“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孙仲衍,江右诗派昉刘子高”,即“越诗派”,以刘基为代表;“吴诗派”,以高启为代表;“闽诗派”,以林鸿为代表;“岭南诗派”,以孙蕡为代表;“江右诗派”,以刘子高为代表。他说这“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诗薮》续编卷一)。他还从诗人的地域分布情况入手,对明初以来诗

① 转引自陈庆元《区域文学史建构刍议》,《江海学刊》1994年第4期。

坛的南北力量作比较：“国初闻人率由越产……而诗人则出吴中”（《诗薮》续编卷二），“至弘、正间，中原、关右始盛；嘉、隆后，复自北而南矣”（续编卷一）。“当弘、正时，李、何、王号海内三才，外如崔仲凫、康德涵、王子衡、薛君采、高子业、边廷实、孙太初，皆北人也。南中惟昌谷、继之、华玉、升之、士选辈，不能得三之一。嘉、隆则惟李于鳞、谢茂秦、张助父北人，而南自王、汪外，吴、徐、宗、梁不下十数家，亦再倍于北矣。”（《诗薮》续编卷二）

徐泰在《诗谈》中针对当代文人诗作风格进行了评价，其中亦对地域有所关注，如他称国初诗坛：“莫盛吴下，但未尽脱元格。至王行、王汝玉辈，渐入清雅，然不及高、杨耳”；他称赏明初诗人，认为其“金华胡翰雄壮，苏伯衡丰腴”；“宋景濂、王子充诗亦纯雅以文名”；“临川甘瑾，工于律”；“临川揭孟同、上饶张孟循、金陵夏允中、德兴程邦民，格调相似”；“嘉禾鲍恂，大雅君子；贝琼豪迈之士”；“云间袁凯，师法少陵，格调高雅”；“岭南孙仲衍时称五杰，唯仲衍清圆流利，明珠走盘，不能自定”；“闽南林鸿，师法盛唐；唐临晋帖，殆逼真矣，惜唯得其貌”；“庐陵杨士奇，格律清纯，实开西涯之派”等等。足见学者对地域因素的重视。

然而自古以来，由于历史的演进、朝代的更迭，统治者对区域的划分各不相同，一些地区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阶段被划入不同的区域，同一个地区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地名也不尽相同。但是虽然数度变更，很多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仍保持着其自有的连续性。“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局面，行政区划相对稳定，更为我们今天古代文学的‘区域研究’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以今天的行政区划为基础研究古代的文学，还有立足当代并联系古今的意义。”^①因此，区域文学研究在今天的文学研究者看来，显然更具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某一地区悠久的文化传统与优秀的文学成就，并进一步探究此地域作家与作品独有的地域特征；而且，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基础展开研究，能够使得我们在研究视角上打破旧有模式的同时，又能立足于当前，为本省本地区文学创作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然而，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虽然某一区域的文学发展自有其独特性，但从整体而言，各区域文学的发展，不可能背离文学发展的总规律。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区域与区域之间文学发展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本区域作家与作品风格对其他区域甚至

① 李时人《论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全国文学发展的影响等等,只有综合考虑这几方面因素,才能使地域文学研究更为可行且更有价值。

江苏位于我国东部沿海、长江下游。旧以江宁和苏州两地的首字得名。春秋时分属吴、楚、宋等国,战国时属楚,秦时属会稽、东海、泗水及郢等郡,汉时属徐、扬二州,唐时属河南、淮南、江南等道,宋时分属江南东、两浙、淮南东等路,元时属河南和江浙行中书省,明时直隶南京。江苏境内以平原为主,气候温润、物产丰富。长江、淮河、大运河和太湖、洪泽湖等交织成稠密的水网,长江三角洲为全国著名的河网区,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

江苏地区历史文化悠久,自古人才辈出,如以《七发》著称的淮阴作家枚乘、建安七子之一的射阳作家陈琳、慷慨悲歌的连云港东海诗人鲍照、以《世说新语》、《幽明录》闻名于世的徐州作家临川王刘义庆、著名画家无锡人顾恺之、《抱朴子》的作者句容人葛洪、宫体诗代表作家常州人梁武帝萧衍父子、徐州人刘孝绰家族、《春江花月夜》的作者扬州人张若虚、《二十四诗品》的作者盱眙人司空图、以填词著称的徐州人李璟、李煜父子、扬州人冯延巳等等。

随着文人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不断探索,同时结合本地风貌、发挥本地区特有风韵,在传统民间风俗、民歌谣谚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文学艺术风格,并在一段时间集结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文人集团、文学创作流派。这一点在明代尤其突出。“文学的‘流派研究’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研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对某一历史时期而言,‘流派’的出现往往是文学发达和繁荣的标志。”“在中国古代,一个地区‘文化’发达与否的标识,往往取决于这个地区‘文化人群’(即中国古代所谓的‘读书人’)的数量和质量。”^①明代江苏地区的作家数量众多,作品极其丰富,这尤其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这一时期的江苏作家不仅有意为诗,而且着意于诗歌理论的探讨与总结,他们或一人、或结成社团、创建诗派,其成员大多来源广泛,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在与不同地区文人交流切磋的过程中,他们着力完善和发扬自身的诗论主张,从而为推动江苏地区诗论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基于以上论述,本课题立足于江苏这一区域,结合本地区文化传统、风土民俗、思想观念、审美取向等几方面因素,着重分析、研究江苏籍或出生于江苏地区的,从元明之交至明清之交的作家在诗歌理论方面的主要观点、发展概况及代表著作,并以江苏

① 李时人《论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地区为核心,兼及江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在诗论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江苏地区诗论对全国诗论发展的影响等。

本书将明代江苏地区诗歌理论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元明之交;弘治、正德时期;嘉靖、隆庆时期;万历时期;明清之交。

第一个阶段,即元明之交,主要包括元末及明初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以杨维桢为代表的江浙社团。这批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苏作家,如昆山顾瑛、无锡人倪瓒等,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一方面承继元代风气,同时又具有本地域的独特风貌;其次则是以吴人高启为代表的吴地作家,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注重辨体,主性情,重气格,引领明初的吴中诗坛;之后的正统、成化年间,江苏籍作家在诗歌理论上既受当时的台阁体影响,又展示出自身独特的风格。随着江苏籍上层官僚与本地域文人作家的频繁交往,大大促进了诗歌创作风格与审美倾向的沟通与互补,从而推动了江苏地域作家的诗歌理论批评。

第二个阶段,即弘治、正德时期。在以吴人沈周为代表的吴中作家的努力与影响下,吴地原有的浓厚的文化积淀得以进一步发扬,以都穆、徐祯卿为代表的吴地作家,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在诗歌理论方面都有卓越的成果;以吴地文徵明为代表的文氏家族于此时直至明末清初都不乏骄人的创作成就;以吴人顾璘为代表的金陵作家群,在广泛地交流切磋中,产生了许多诗歌理论方面的真知灼见。这在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主盟诗坛时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

第三个阶段,即嘉靖、隆庆时期。早年受前七子、阳明心学影响的武进作家唐顺之,于这个时期在诗论倾向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在著文的同时,于诗论亦有独到的见解与主张。吴地作家黄省曾、黄姬水父子和以皇甫汈为代表的皇甫四兄弟,在与前七子、嘉靖八子等作家交往的过程中,既明显受其影响,又具有本地域独特风格;后七子领袖太仓作家王世贞在主盟诗坛近二十年期间,不仅于诗歌理论上取得了卓越成绩,而且影响了一大批中原文人的诗歌创作,从而使诗论重心逐渐向江浙转移。

第四个阶段,即万历时期。受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诗论影响,以王世懋为代表的七子派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同时积极对之进行有力的补弊,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在吴中任职期间,与吴地作家广泛交流,这对其诗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作用;江阴人许学夷,常熟人冯复京,结合自身长期的体验与感悟,在诗歌理论上博采众长,成果突出;竟陵派代表作家钟惺、谭元春为扩大本流派的声势,主动来到江苏与当地文人广泛交流,对江苏地区的诗论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五个阶段,即明清之交,主要指明末天启、崇祯时期至清初。在这一时期,诗歌理论方面已日渐丰富成熟,随着社会政局的动荡、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以复社、几社为代表的复古诗论成果显著,其中以太仓人张溥为代表;娄东派文人吴伟业,虞山派代表作家钱谦益,在诗歌理论上皆有建树,其中以钱谦益成果最为突出,其在对有明一代诗论发展进行归纳总结的同时,又提出自己的见解,影响直至清初,其弟子冯班、冯舒兄弟为其羽翼,在诗论主张上同中有异;这一阶段的遗民作家、学者,在诗歌理论上的成就,也应受到一定的关注与重视。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元明之交的诗论	1
第一节 铁雅派与元明之交的吴诗坛	1
第二节 高启等吴中诗论	9
第三节 台阁风气下的江苏地区诗论	22
第二章 弘治、正德时期的诗论	36
第一节 沈周与吴中诗坛	40
第二节 都穆的《南濠诗话》与徐祯卿的《谈艺录》	53
第三节 文徵明及其家族诗论	62
第四节 顾璘与金陵诗坛	75
第三章 嘉靖、隆庆时期的诗论	84
第一节 唐顺之与“自然本色”论	95
第二节 皇甫兄弟与“中和”、“风雅”论	99
第三节 吴地与中原诗论的桥梁——黄省曾父子	109
第四节 王世贞对格调说的继承与改良	116
第四章 万历时期的诗论	131
第一节 公安派诗论的确立及与江苏文人的交往	144
第二节 王世懋对格调诗论的救弊	150
第三节 许学夷与《诗源辩体》	156
第四节 冯复京与《说诗补遗》	164

第五节 焦竑与“神”“法”相兼论·····	168
第六节 竟陵派影响下的江苏文人诗论·····	172
第五章 明清之交的诗论·····	180
第一节 钱谦益的“世运”“学养”与转益多师·····	187
第二节 吴伟业、张溥的风雅复古观 ·····	206
第三节 二冯兄弟的美刺比兴论·····	210
第四节 冯梦龙、金圣叹等文人学者诗论 ·····	213
附录：江苏明代主要诗人、诗论家小传·····	222
主要参考文献及征引书目·····	272
后记·····	279

第一章 元明之交的诗论

第一节 铁雅派与元明之交的吴诗坛

以太湖为中心、上海为龙头，北连苏、锡、常，南接杭、嘉、湖，这一地区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它包含在长江流域文化领域之内，是中国古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太湖地区的三山岛是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曾发掘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360 平方米，出土打制石器五千多件，发现中晚期哺乳动物化石 22 种，此地被考古学界命名为“三山岛文化”。公元前 11 世纪的周代，中原周国国君古公亶父有意将王位传于三子季历及其子昌（周文王）的秘密泄露于朝野，古公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避祸逃往江南荆蛮之地，相继在今天的无锡梅里拓荒盖屋，并被拥立为“勾吴”小国首领。吴人吸收了泰伯、仲雍带去的中原文化，形成了新的吴地区域文化。及至十九世孙寿梦（前 585—前 561）时，国力逐渐强大。寿梦继位初年，亲赴洛邑朝见周天子，学习王朝礼乐典章，文化技艺；并派其子季札到中原各国考察观礼，结交良臣名将，纵论盛衰大势。寿梦继位次年，通过重用由楚奔吴的大夫申公巫臣，以训练陆军，并首创我国历史上第一支水军，为强吴打下基础。前 560 年，吴王诸樊由无锡梅里迁都于此，苏州地区始称“吴”。其孙阖闾于前 514 年继位后，扩方圆三里之都邑为方圆四十七里的大城。他任贤治国，吸收了以伍子胥为代表的楚文化和以孙武为代表的齐文化的营养，形成吴地文化新时期。前 473 年，吴并于越，后归楚。

苏州在六千年前就有人聚居于此。远古时期，苏州一带已创造了人类文明与文化生活，揭开了吴文化的序幕。苏州又称姑苏、姑胥。东汉王符《潜夫论·边议》载：“范蠡收责于故胥。”盖胥者舜臣名，佐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吴者也，故名其地曰故胥，历代转音为姑苏。又据《姑苏台图经》中有关姑胥台的记载，以及《左传》中关于胥门城的解说，一般认为吴地人怀念春秋之际德高望重的贤臣伍子胥，故以其名冠山命

城,故有胥山、姑胥山之称,又名吴城为“姑胥城”。另据方言音韵学考证,吴依软语声柔似水,“姑胥”一词发音似“姑苏”。又据《辞海》记载,姑苏得名于苏州西南的姑苏山(又名姑胥山、姑余山)。春秋时吴王阖闾于山上建胥台,故又名胥台山。胥台,即姑苏台,为我国历史上的豪华建筑之一,后焚于吴越战火。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会稽郡,设吴县为郡首邑,他东巡时曾登临姑苏台基。秦末项羽起兵于吴。楚汉之争分会稽郡置吴郡。汉司马迁亦曾来此寻访。

六朝前,江南仍是地广人稀、草莱未辟的蛮荒之邦,经孙吴数十年经营,至西晋已出现“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窳隆异等……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左思《吴都赋》)的景象。南朝梁太清三年(549)设吴州。隋开皇九年(589)废郡改称苏州。隋唐之时苏州船贸发达,至唐代中期,国家财赋已多仰仗江南,韩愈《送陆歙州诗序》:“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一九)唐崔颢有《姑苏台赋》云:“有台巍然,出于群山,荒基峻级,高彻云间。”五代之际市井繁华。宋政和三年(1113)苏州升为平江府,随着经济重心的多次南移,江南地区经济已十分繁荣,如北宋元丰年间,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郭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乃江外之一都会也”(同上卷上《物产》)。北宋后期,江南的经济已超越北方,如《字内辨》中记载:

自晋元南渡,东南文物渐盛,至于李唐,益加繁昌。……以至元丰中,比往古极盛之时,县邑之增,几至三倍;民户之增,几至十倍;财货之增,几至数十百倍。至于庠序之兴,人才之盛,地气天灵,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极盛之时,有所不逮。天下之势,正犹持衡,此首重则彼尾轻。故自东南渐重,则西北渐轻;以至宋,东南愈重而西北愈轻。(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六《财用门》“东南县邑民财”条引)

吴衡进图亦称赏道:“天下地利,古盛于北者,今皆盛于南。……漕运之利,今称江淮,关河无闻;盐池之利,今称海盐,天下仰给,而解盐荒凉;陆海之利,今称江浙,甲于天下,关陕无闻;灌溉之利,今称浙江、太湖,甲于天下,河渭无闻。”(同上《财用门》“东南财赋”条引)南宋建炎二年(1128)江南遭金兀术兵陷,德祐元年(1275)又受蒙古兵马入侵,城毁即复。元朝改平江府为平江路。明洪武年间改平江路为苏州府。苏州府一般又称吴中、吴门。在明代苏州府主要统辖一州七县,即吴县、长洲县、吴江县、常熟县、昆山县、嘉定县、崇明县和太仓州。

苏州地区全境依山傍水,西部高平、河川纵横,西南多山,东部低洼多湖。隋时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由无锡北来,经苏州西南部,流向今天的浙江省。苏州“东距太仓,西通阳羨,南界嘉兴,北距大江。……水则长江自江阴流入,经常熟县境而东注于海;太湖中有七十二山,吞吐波际,常、润、宣、歙之水皆纳于此,而下注三江;运河则自嘉兴而北经郡城会胥江,而西北入无锡县境。”“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能够“擅江湖之利,兼海陆之饶,转输供亿,天下资其财力”(光绪《苏州府志》卷二《形势》)。苏州坐落于水网之中,荡泊星罗,泉潭棋布,川渠错综。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东方见闻录》中这样描绘苏州:“是一颇名贵之大城,居民……持商工为活。产丝甚饶……其城基大,周围有六十里,人烟稠密。”“此城有桥六千,皆用石建,桥甚高,其下可行船,甚至两船可以并行。”苏州城外湖泊密布,城内河渠纵横,贯穿于街市房舍、门桥巷坊之间。历代文人雅士对这块小桥流水人家的沃土更是吟咏不尽。唐代诗人白居易谓苏州水景“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刘禹锡有“春城三百七十桥,两岸朱楼夹柳条”的诗句;杜荀鹤《送人游吴》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明月夜,乡思在渔歌。”^①

元代中期以后,苏州一带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到元末衰乱之世,它既是思想解放的阵地,也是群雄争夺的战场。浙江文人杨维桢一生主要活动于苏州及周边地区,他继承和发展了元初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学复古思想,主张摆脱宋金末世积习而径师盛唐。这一时期,以杨维桢和“铁雅派”为核心,昆山人顾瑛和玉山草堂的众多诗客,以及浙东陈樵、项诤、李序等,共同掀起了宗法长吉之高潮,“元末诸人,竞学长吉”(胡应麟《诗薮·外篇》卷六)。此期的文人们从李贺诗中学到了雄奇荒幻,又熔之以太白诗的豪情飘逸与义山诗的深情瑰异,形成了崇尚雄奇诡谲的诗歌风格,打破了元中期温婉的诗歌创作规范,远离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准则,更多地流

^① 转引自段宝林、江溶主编《山水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6、13。

露了真情真性,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创作追求^①。

杨维桢多次阐发诗本情性的观点,主张抒写真实情感,反对格套的束缚。他在《李仲虞诗序》中说:“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东维子文集》卷七)其《郑韶诗序》又说:“或问:诗可学乎?曰:诗不可以学为也。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上而言之,雅诗情纯,风诗情杂;下而言之,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东维子文集》卷七)在此基础上,他又强调个性独创,反对摹拟剽窃,由学古而走向拟古。因此,杨维桢鄙薄齐梁、晚唐与季宋的诗歌,而强调学习古代那些“情性不野、神气不群”的诗人精神,标举《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和陶渊明、杜甫、李白、李贺的诗歌。

在诗歌创作上,杨维桢偏好李商隐、李贺、温庭筠等人的诗歌风格^②,他轻视诗歌的声律:“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蕉凶律选序》,《东维子文集》卷七);“律诗不古,不作可也”(释安《铁崖先生拗律序》,《东维子文集》卷七附录引杨维桢语)。因而,他所写的律诗,往往具有“硃硬排纂”(《蕉凶律选序》,《东维子文集》卷七)的特点。

杨维桢作诗“上法汉魏”,又出入于唐代李白、杜甫、卢仝、李贺、温庭筠、李商隐诸家之间^③。张雨在《铁崖先生古乐府叙》中评价云:“《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之旨,惟古乐府为近。……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

① 《四库全书总目·闲居丛稿提要》:“盖元大德以后,亦如明宣德、正统以后,其文大抵雍容不迫,浅显不支,虽流弊所滋庸沓在所不免,而不谓之盛时则不可。”实是拿元大德以后的诗文与明宣德以后的台阁体相比。这一盛期的极点,大致可以断至泰定、天历之交(1328),上年袁桷去世,杨维桢登进士第,而“四大家”中的杨载已于六年前(1323)去世,范梈也在十年后病故。此后,尽管虞、揭仍在京师文坛执牛耳(虞集也在五年后即元统元年离京南归),但杨维桢主盟东南文坛的时代也已开始。

② 清代四库馆臣评说杨维桢的诗歌和元末诗风的弊端云:“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维桢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抵于青莲、昌谷,纵横排纂,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铁崖古乐府》)

③ 199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邹志方点校的《杨维桢诗集》,点校者在《前言》中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评价杨维桢诗的艺术特点,说:“铁崖乐府风格多样,有的幽艳奇诡,隐含汉乐府情调;有的柔媚旖旎,具有南朝民歌风味;有的清新自然,可以窥见李白情采;有的险怪兀莽,能够看到韩愈、李贺影响;有的秾丽妖冶,又带上了温庭筠、韩偓色彩。至于竹枝词,既有刘禹锡的风情,又有自己独特的韵致。这是由杨维桢转益多师的艺术修养决定的,也是杨维桢才务驰骋、意务新异的艺术追求的结果。”

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铁崖先生古乐府》卷首)这实际上揭示了杨维桢倡导古乐府的宗旨。此外,他的琴操、竹枝词、宫词、香奁体还分别受到了韩愈、刘禹锡、王建、韩偓的影响。正因为杨维桢对唐代诸名家乐府都有所取法,所以顾起纶将张雨的话修正为:“廉夫上法汉魏,出入李唐,其古乐府有旷世金石声。”(《国雅品》)于是,元前期以来诗歌“宗唐复古”的思潮,发展到杨维桢这里便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活力,他认为诗既可以上法汉魏乐府以复古,也可以径师唐人以返于古。元末古乐府运动由此而兴起^①,它既是对元中期以来社会意识发生转变和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反映,也是元前期以来诗歌“宗唐复古”思潮继续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以元末江浙地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与元代社会政治疏离,所表现出来的纵情诗酒的旁观者心态。

杨维桢所倡导的古乐府,既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能够反映衰乱之世的社会现实,又便于表现人性,进行人生思考,加之体裁多样,形式自由,正可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他倡导古乐府的根本宗旨,是为了表现情性,对人性 and 人生进行思考,要求诗歌保持独立的文学品位,得其神气和韵味,而不愿意让它成为理学的附庸。他的这种主张首先得到了他的诗友李孝光的赞赏和支持。李孝光(1297—1348),字季和,号五峰狂客,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有《五峰集》。《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元诗绮靡者多,孝光独风骨道上,力欲排突古人,乐府古体皆刻意奋厉,不作庸音,近体五言疏秀有唐调,七言颇出入江西派中,而俊伟之气自不可遏。”杨维桢和李孝光作为元末古乐府运动的倡导者,虽然也关注汉魏乐府的风雅比兴,但其根本宗旨却是为了恢复诗歌“吟咏情性”的传统,摆脱后世思想观念和诗歌形式上诸多格套的束缚,从而达到振衰起弊、革新诗风的目的。他们认为古乐府本于情性,不受体裁格律的束缚,可称为对乐府诗的一大发现。因而能够从发展的眼光、开放的视野来看待乐府诗的

^① 元末古乐府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黄景昌与吴莱。黄景昌主张从辞的角度看待乐府,“合乐府、古诗为一通”,使拟古之作“徒欲以其辞胜”;吴莱主张从声的角度看待乐府,坚持“古乐府之名不可以不存”,要求拟古之作应“倚其声以造辞”。吴莱所说的“声”,实指汉魏乐府的“雅韵”、“正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要求雅乐复古时风的影响。黄说总结过去,代表了元前期以来人们的普遍认识;吴说昭示未来,成为元末古乐府运动的先声。江南黄景昌(1261—1336),字明远,浦江人。曾从谢翱、方凤游,入月泉吟社,终生不仕,精于《尚书》、《春秋》之学,有《古诗考录》等。吴莱(1297—1340),字立夫,浦江人。少从方凤问学,因大受赏识而成为方凤的孙女婿。有《渊颖集》等。(转引自黄仁生《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页165—166)

流变与创新,进而“转益多师”,取法多门,甚至于一无倚傍^①。

他的这一创作主张得到了后人尤其是今人的充分肯定,刘明今在《论铁崖体》中云:“铁崖体的风格不妨以雄畅怪丽一语以概之。他和李贺一样务求创新,要造新言来代替陈言,他们都向古乐府学习,然而比之于李贺,杨维桢似更重视古乐府的气与势。他虽然倡言复古,但只有少数古乐府是如宋濂所说的‘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其大部分作品则并非如是……他是要从情性神气上去追摹古人的高格。正因为此,他不学李商隐而学李贺,且不满足于李贺,而是取李贺之奇而兼及李白之势,并力图由此上探汉魏六朝之格。”^②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中评价铁崖体说:“‘铁崖体’在体裁形式上以‘古乐府’为主,力求打破古典主义的诗论规范,走出元代中期模拟盛唐、圆熟平缓、缺少个性的模式,而追求构思的奇特,意象的奇崛,造语藻绘的狠重,在诗的整体审美效果上具有‘陌生化’的特征与力度美。而这些,都应出自诗人的情性,从而使作品富有相当的个性色彩。”^③杨维桢等人无意于对唐诗风格进行追摹,无意于以“雅正”的风格来规范自己的情怀与诗意,他们更多的是取法唐人重性情、重感兴的创作方式。因而在他们对唐诗进行解读、接受时,更倾向于获得其诗中活跃而流动的生命力。

元末出现的铁雅派^④(又称铁崖派)是一个以杨维桢、顾瑛、倪瓒为中心,以复兴古乐府为旗帜,主要由在野和半在野文人所组成的诗歌流派。它的构成与活动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创作风格也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东吴富家,唯松江曹云西、无锡倪云林、昆山顾玉山,声华文物可以并称。”(卷一六)其中尤以顾瑛之玉山草堂为盛。杨维桢被推为玉山盟主^⑤,其《玉笥集叙》云:

我朝习古诗如虞、范、马、揭、宋、泰、吴、黄而下,合数十家,诸体兼备,独于古

① 转引自黄仁生《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05 年版,页 12、62、162、173。

② 刘明今《论铁崖体》,《学术月刊》1985 年第 3 期。

③ 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351。

④ “蒙古之末,杨廉夫始以唐体杜学,救宋诗之失,顾其自命曰铁,早已搏攫张拳,非廓清之大器。然其所谓杜者,犹曲江以前,秦州以上之杜也。”(王夫之《明诗评选》“杨基《客中寒食有感》”条,页 279)这里所指的“曲江之前,秦州以上”即指杜甫《曲江九日》、《秦州杂诗》二十首、《发秦州》等之前的诗作。

⑤ 清方起英《古今诗麈》载:“松江吕巷有吕璜溪家,开应奎文会,走金帛,聘四方能诗之士,请铁崖为主考,试毕,铁崖为第甲乙,一时文士毕至,倾动三吴。”

乐府犹缺。泰定、天历来，予与睦州夏溥、金华陈樵、永嘉李孝光、方外张天雨为古乐府，史官黄潛、陈绛曾遂选于禁林，以为有古情性，梓行于南北，以补本朝诗人之缺。一时学者过为推，名余以铁雅宗派。派之有其人曰昆山顾瑛、郭翼、吴兴郑韶^①、钱塘张映、嘉禾叶广居、桐庐章木、余姚宋禧、天台陈基，继起者曰会稽张宪也。（《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卷四）

杨维桢在元末诗坛的领袖作用，主要通过他与铁雅派其他成员的交游唱酬以扩大影响，并通过作品的传播和时风的激荡而引导诗坛潮流，从而使其倡导的古乐府运动得以扩展。就创作队伍而言，它是以铁雅派成员为中坚而向社会各阶层诗人扩展；就波及地域而言，它是以吴越为中心而向南北辐射；就发展态势而言，它是以元末为高潮而向明初延伸。置身于铁雅派之中或受其影响的吴地文人当推顾瑛、倪瓒、杨基、高启等。

顾瑛（1310—1369），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号金粟道人，平江昆山人，有《玉山璞稿》、《玉山逸稿》。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顾钱塘德辉”条记载他：“轻财结客，年三十始折节读书，师友名硕。购古书名画、三代以来彝器秘玩，集录鉴赏。举茂才，署会稽教谕，力辞不就。年四十，以家产付其子元臣，卜筑玉山草堂，园池亭榭，饴馆声妓之盛，甲于天下。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觞咏倡和，都为一集，曰《玉山名胜》。又会萃其所得歌诗，曰《草堂雅集》。淮张据吴，避隐嘉兴之合溪。母丧，归绰溪。张氏再辟之，断发庐墓，诵大乘经以报母，自称金粟道人。至正之季，元臣为水军副都万户，仲瑛封武略将军、飞骑尉、钱塘县男。洪武元年，以元臣为元故官，例徙临濠。二年三月卒，年六十。”

顾瑛为昆山巨富，他筑别业于玉山佳处，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声伎之美，冠绝一时。何良俊：“顾氏在胜国时，为东吴望族，仲瑛读书好礼，其园苑之盛称甲于江南，即所谓玉山名胜者是也。一时名流如柯丹丘、杨贞居、倪雲林、郑德明辈，乐与之游处，诸名胜处皆经诸公品题。”（《何翰林集》卷一二《西园雅集序》）顾氏“玉山草堂”在江南园林中最负盛名，建亭馆二十四处，其名有“小蓬莱”、“碧梧翠竹堂”、“湖光

① 郑韶，字九成，吴兴人。……作诗不习近世，必欲追踪盛唐。铁崖以为与北州李才辈相上下，序其诗云：“吾求诗于东南，永嘉李孝光、钱塘张伯雨、天台丁复、项炯、毗陵吴恭、倪瓒，盖亦有本者也。近复得永嘉张天英、郑东、姑苏陈谦、郭翼，而吴兴得郑韶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页129）